企业家日报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邮发代号:61—145

经济学家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刘涛雄 黄文夫 启文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刘涛雄　丁茂战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编辑部主任:廉明　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方芳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轼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158 期 (总第 270 期)　2016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五　丙申年六月十九　投稿邮箱:j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新经济呼唤理论与制度创新

盘古智库"智见"系列讲座

《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分享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7 月 16 日下午，第十期盘古智库"智见"系列讲座《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分享会在香山书院举办。主讲嘉宾为盘古智库高级顾问、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杨培芳教授。参加分享会的嘉宾们围绕着杨教授的新书《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聚焦新经济理论产生的必要性以及对其未来的发展模式和愿景,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此次新书分享会由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先生主持。参加本次活动的专家学者有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院原院长、中国信息经济会原理事长陈禹，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所副总工何霞,察哈尔学会创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民生银行研究院秘书长李小宁,中央网信办调研员余鲲,人民邮电报社主编王保平，人民邮电出版社普华公司总编辑贾福新。此外,本期分享会还吸引了包括新浪财经、湖南卫视、财经杂志等在内的十余家新闻媒体的参加与关注。

盘古智库高级顾问、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杨培芳教授

察哈尔学会创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

杨培芳教授认为，随着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经济理论,不论是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都已经不适合新的经济时代了。杨教授在书中写到:"互联网的扁平、互利的公共理性精神正在缔结包括'市场决定、政府保障、社会协同'在内的三只'挽在一起的手',它们将清除先进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制度羁绊,促使人类进入透明、高效、公平、普惠的信息社会"。杨教授在分享会中谈到,人类已经从分散封闭的农业生产力和集中垄断的工业生产力时代，进入到了分布关联的信息生产力的新时代。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适应信息生产力发展的新理论和新制度很可能在东方大国土壤里萌生。

正如一切时代的转型都是从新型生产工具的创造与产生开始，面对从工业社会到信息时代的伟大变革，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而不是守成,增量而不是存量"是杨教授新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关于创新,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却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阐释。梁老师认为,创新的重点在于构建,而不在于颠覆。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有其独特的核心方法论。如果方法论已经不适合当时当下，那么此方法论可以被修正,可以被边缘化,可以被部分替代,但绝对不会被完全抛弃。

察哈尔学会创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对此观点表示赞同。柯秘书长表示,旧事物的功能和使用率也许会随着新事物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但绝对不会就此销声匿迹、踪影无存。正如社会形态从农业向工业、又从工业向信息的转变,尽管时代的名称变了、生产力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在工业时代中,我们依然需要农业,在信息时代里,工农亦必不可少。因此,梁春晓老师认为,创新的思维不要被"不破不立"所毒害。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时候,事物会被主动地消灭和颠覆，而这并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因此,创新的重点不在于解构对象,而在于构造自己。

易鹏理事长认为，杨培芳老师的新作为分化变动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支撑，也为回答当前日益艰难的理论拷问而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此外,"未雨绸缪"的观点也是杨老师新作中一大亮点。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经济下的很多案例值都得我们做好总结，进而在总结中做发散、做启迪、再做开创。

易理事长提出的第三个观点与梁春晓老师的"不轻易做颠覆"不谋而合。他表示,历史上的所有理论都处于复合状态，想用一个理论解决社会上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此外，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也提出了关于"理论创新为什么这么难"的问题。他认为,首先,信息革命的表现现在还不充分,让人无从应对。第二,转型时期,不同利益获得者将设置不同的转型障碍。第三,碎片化思想家过剩，对于真正的思想家的定义不明确。第四,"归纳法"多,"演绎法"少。所以,不被利益所迷惑,不被困难所阻止,也许就会有创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所副总工程师何霞指出，中国新经济研究是与中国庞大的新经济体量、丰富的互联网创新实践相关联的，这些为新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可探索的空间。中国正处于信息生产力推动社会分工、生产关系和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的制度创新亟待新经济理论□指导与支撑。我们看到新经济理论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随着新经济理论体系逐步构建，将对推动制度创新起到重要作用,从长期看,二者相互推动,互为协同。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院原院长、中国信息经济会原理事长陈禹教授提出了一个实现经济理论创新的思路,那就是"没有合作,分工是创造不出来财富的"。他认为,进行经济理论的创新,可以先有所侧重的分头研究,再将各方观点从不同角度综合起来，去构建新体系。

中央网信办调研员余鲲也再次强调,在研究新经济的同时，作为核心和新时代载体的信息经济不能丢。把中国建设成为"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的目标还是要坚持。

针对杨培芳教授在书中所提到的"公共理性",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认为，结合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关联理性"也许比"公共理性"更加恰当。

在分享会的最后，杨培芳教授对"新经济"做出了期许。他希望,中国"新经济学派"能够逐步建立一个新经济理论框架，让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到"新经济"的研究中来,促进公平普惠信息社会的到来。

(相关链接下转 02 版)

(秘书处)

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个较长时期增速平缓下行、但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居民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经济。

不必为中国经济平缓下行而悲观

■ 陈稻田

7 月 15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6 年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数据。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7%,和一季度持平;通胀温和,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速是 2.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GDP 达到 54.2%，比 2015 同期大幅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让"L 型"增长的观点多少得到了一些支持。

不过，两个反差极大的投资数据可能更值得关注。一个是 1—6 月的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高达 20.9%，相比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 7.1%的增长,基建投资可以说是火箭式增长；另一个是民营投资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速仅为 2.8%，而在 2013 年，这个数字还高达 23.1%,这可以说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碰巧的是，笔者在 2014 年初曾在 FT 中文网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应警惕投资悬崖》,现在来看,预测大致是准确的。民营投资占中国总投资的比重超过 60%，沿着当前的下行趋势,到 2017 年我们可能会看到民营投资开始出现负增长。实际上,即便是考虑了国有投资,中国的总体投资增速也已现出颓势:2014 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是 40.6 元,而 2015 年是 40.8 万亿,几乎没有增长。

投资为什么会断崖式下行?"**对长期经济增长来说,生产率几乎是全部**",克鲁格曼在评论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时候这样说。时间虽然久远,但当我研究当前中国经济的时候,这句简洁的话却越发显示出它的力量。生产率的提高,简单地说,意味着在资源投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也能实现产出增长。在索罗模型中,给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个边际资本回报率接近零的资本存量水平，这就是投资的极限水平。一个经济体可以通过中等强度的投资缓慢接近这个极限，也可以通过高强度的投资快速接近这个极限。但是,在相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条件下，上述两个发展路径殊途同归，人均产出会收敛在生产率决定的极限资本存量水平。高投资可以让你起步跑得更快,但不一定更远。

中国的发展路径很大程度是通过高投资促进经济高增长。在 1978—2015 期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水平是 39.5%，在 2006—2015 的十年期间则更是达到了平均 45.3%的惊人水平,最高的一年是 2011 年,达到了 48%。作为参照,美国的投资率长期处在 20%左右。伍晓鹰认为,中国改革时期的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解释 15%，而资本投入的解释率高达 74%。高投资率和生产率缓慢增长并存的结果将是边际资本回报率的快速下降。IMF 在其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2016 年 4 月)估计，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从 2010 年的 4.6%快速下降到 2015 年的 1.8%。民营经济对投资回报率的敏感度要高于国有投资，它的快速下滑正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在不断恶化。

中国需要新一轮的投资刺激计划吗?

投资增速下行和经济增速下降引发了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今年以来,国务院相关部门对民营经济投资增速下降进行了很多调研,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出台政策鼓励民营经济投资。政府投资更是不遗余力,例如为了支持投资，政府对地方城投企业的发债限制有所放松,2016 年一季度的城投债发行甚至创出了 6501 亿的季度历史新高。

在学术界,"刺激"还是"不刺激"也引发了宏观政策的激烈争论。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判断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 PPI 出现了长期持续的通缩，因而主张加大投资力度,认为投资是"硬道理"。这看起似乎是有依据的，从 2012 年 3 月份起，中国的 PPI 同比增速就持续为负数，在 2015 年 9 月出现了低至-5.95%的水平。PPI 的通缩也造成 2015 年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下降为-0.45%。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依据的理论也可以说是简单而坚实：价格上不去肯定就是需求不行。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经济特别的结构性因素。PPI 通缩的原因是普遍的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是过去政府推动的高投资造成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不是教科书里面的居民主导的，而是政府主导的。考虑一下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周期理论,居民的时间偏好决定储蓄率。高投资伴随着居民自愿的高储蓄，也就是放弃当前消费,积累资本,为了以后更多的消费。当投资到了相当阶段,居民会降低储蓄,增加消费,来享受前面高投资形成的资本。在中国,这有所区别,高投资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当资本积累到很高水平的时候，居民并没有相应的购买力来利用这些形成的资本。更成问题的是,这些资本的形成,主要并不是为了后面满足居民消费的，而是为了建造更多的资本品。

这时候需求的不足,PPI 的下降，和教科书里面的需求不足,看起来相似,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上述的差别：教科书里面居民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者,而中国并不是。正是因为这个微小但极其重要的差别，这些学者的分析出现了错误。考虑到上述结构因素,我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更应该关注 CPI 和劳动力市场。当前,CPI 在温和区间,6 月的 CPI 单月同比增速是 1.9%,2016 年前 6 月的累计同比增速是 2.1%,应该说处在大部分央行认为的"最舒适"区间。 再看劳动力市场,2016 年 1—4 月的新增城市就业人口 443 万,与 2015 年同期持平,2016 年一季度的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为 1.07,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 10.6%,增速平稳。应该说,从"居民部门"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适度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没有低于潜在增速，即便 PPI 经历了较长期的负增长，中国政府不需要更强的投资刺激计划。

如果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但是资本产出比会不断提高,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会不断恶化。更糟糕的是,扩大投资之后会面临更大的"需求不足",因为新增产能更大了，后面需要更大的投资力度来充分消化这些产能！我看不到这种政策会有出路。此外,一个投资率高达 45%的经济还觉得投资不足，这可能是违背常识的。PPI 的下行，压缩了资本形成部门的利润空间,降低了投资冲动,实际上是经济对过度投资的一种矫正,合适的政策应该是顺其自然。

可是如果不推行更大的投资刺激计划,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中国经济会陷入某种程度的危机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存量资本（边际资本投入的产出已经为负数),并且资本没有折旧（这意味着投资将是零),那么经济会因此陷入萧条吗? 我认为不会,至少从充分就业的角度来看。虽然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投资降为零的时候,经济会从另外一个路径进行扩张：服务业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而供给将创造更多的需求。假设一个两部门的服务经济,只包括美容师和理发师。由于资本充足和投资萎缩,资本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会进入服务业，美容师队伍扩大了,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收入,部分收入用于自己的美容,部分用于理发消费。而同时理发行业也扩大了，理发行业增加的收入用于购买本部门的服务和美容服务。这是一种分工的扩展,由于服务项目很多,其中可能的拓扑结构会非常丰富（这多少令人想起杨小凯的分工模型)。在没有投资刺激的情况下,服务业的内生扩张自然可以启动,它们互相供给，互相创造需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服务业的内生扩张可以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毛泽东曾经问道:没了胡屠户,难道我们就吃混毛猪? 当然不会! 同样,没有了投资,经济也不会就此陷入萧条，市场有其自然之道（当然，经济增速下行可能会引发债务问题,这值得单独的阐述)。

上述投资为零的情况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在实际当中,投资不会降低到零(至少还需要补充折旧)。但是,上述实验说明的道理一样是有效的，即资本品生产部门所释放的劳动力会进入服务业，服务业的扩张一样会达到充分就业。过去几年中国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每年都上升 1-2 个百分点,2016 年上半年达到了 54.2%的水平，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这也证明了市场的活力。过去几年服务业 PMI 指数持续高于制造业 PMI 指数(比如，最新 6 月的中采指数分别是 52.2 和 50),这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在不断的进行着转型。如果中国可以提供更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环境,相信这个比重将继续快速的提升。一些专家注意到中国经济有韧性，中国较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较大发展空间的服务业,可能是韧性的很大来源。

福利水平最高的增长路径应该是由居民决定资源配置,短缺的部门会涨价,吸引更多的资源，这种经济体的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最符合居民福利。不过,在中国,由于政府的 GDP 赶超战略，更多的资源被动员到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中,服务业的发展是被抑制的。这造成了高增长和低福利的状况。服务业的发展使人的精神生活更丰富，民智的开化往往也伴随着更加完善的制度和人文环境。至于制度的改善对人的尊严和自豪感的提升,亚当斯密有生动的论述,他观察到,在 18 世纪的英国,自由市场制度发展迅速,田间劳作的农民连扶犁的姿态都显得自信而愉快（无独有偶，近两百年后林语堂敏锐地观察到了伦敦牛津街上英国妇女畅快的大笑)。一个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经济才是真正富裕的经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会像工业这么快,在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中国不需要新一轮的投资刺激计划,而是需要新一轮的结构改革。如果我们把观察中国经济是否健康的指标从经济增速转向就业和居民福利，就不会对投资和经济增速下滑产生这么多忧虑了。

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在较长时期增速平缓下行,但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居民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中国经济。它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既不特别让人振奋,但也根本不必悲观,这些都是自然的发展过程。